

# “学术根据地”的建构与超越

◎ 史婷婷

**摘要:**《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作为具有一定时间跨度与内容涵盖面的学术选集,大致依照“由近及远”的逻辑顺序,分为“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三编编纂。这一自洽的编排方式,不但是对吴秀明学术生涯的回顾,而且体现了其治学的“学术根据地”意识。事实上,无论是“根据地”的初步建构,还是建构之后的超越,均指向治学维度的一种自觉状态。而这也是《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及其所内蕴的“学术根据地”意识对当下的重要启迪。

**关键词:**“根据地”意识 内在逻辑 建构与超越

作为带有“自我盘点”意味的学术自选集,《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在吴秀明教授1982年至2017年间发表的300多篇文章中,筛选出35篇代表作的选本。大致按照“由近及远”的逻辑顺序,分为“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三编编纂。它不仅对编者几十年学术研究进行了以点带面的梳理与归纳,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其在治学过程中确立的“学术根据地”意识及其建构与超越。

关于“学术根据地”,吴秀明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并在相关的文章与访谈<sup>①</sup>中从源流、实践等角度对之作了阐述。总而言之,建立“学术根据地”指的是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要寻找主攻的方向,从而集中精力钻研,方可形成独有的学术特色与竞争力,继而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这一点在古今中外许多人文学者身上均可得到体现,无论是纪传体史书的前导司马迁,还是小说戏曲评点的名家金圣叹,抑或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均在文史领域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也为研究“先专后精”提供了实践的依据。而“超越根据地”则是指学人的自我调整与提升,即“打破现有恒定的秩序,使之处于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状态”。<sup>②</sup>当然,此所谓的超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指特定学科、特定方向内部的调整,也意指文、史、哲等学科的彼此敞开状态。就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超越根据地”指的是学者随着经历、阅历的增长,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原有的“学术根据地”进行有意识地调整、扩充、转换,使其在学术研究的视域与质量上得到提升,并进而对整个当代文学学科化、规范化和学理化有所助益。事实上,当代文学领域不乏从文学批评转向史料研究的学者,如程光炜、李洁非等,均在原有对当代文学评论的基础之上,从方法与实践的角度对当代文学“年代学”史料、体制性史料等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考察,其相关研究既富有文学性,又长于历史考辨。简而言之,无论是“根据地”的初步建构,还是建构之后的再建构,均指向治学维度的一种自觉状态,包括当代文学学科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学者应有“学术根据

地”意识,首先是建立之,其次是超越,甚至是再超越之,在建立与多次超越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就很好地对吴秀明主张并身体力行实践“建立根据地”与“超越根据地”进行了呈现。从全书的框架与编排方式中,我们也不难可见其中大致清晰的“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文献史料研究”三个阶段,或者说是治学“三部曲”。从最初的历史文学批评,到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学相关理论探讨,再到当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继而从事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这不仅见证了吴秀明对学术工作的一种“回归”,还体现了其不断深入的学术研究脉络。正是在这样一种建立、超越与再超越中,吴秀明形成并稳固了其独有的学术风格与旨趣。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随着当代文学学科的逐步成熟,有些长期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评论家与学者均在近些年推出了不少成果,但并非所有的学人都能“直面”以往自己的研究,而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缺乏“学术根据地”意识而导致频繁无序变化,对之不能进行对接,前后出现了严重的断裂。正如吴秀明在“后记”所说的那样,“展示自己过往的研究文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时甚至需要有一点点勇气”。<sup>③</sup>无论是文坛还是学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自毁少作”的现象。而吴秀明恰恰在自选集中收录了自己“出道”的第一篇文章《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成熟学者对学术追求的内在逻辑性和一致性。

就具体的内容与编排而言,该自选集上编“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是吴秀明近些年来治学的重心。这一点,无论是在其主持2010年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2015年度国家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中,还是作为前者结项成果的2016年出版65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论著,以及与之具有密切关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史料丛书》,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专题”研究,这里的上编,可以说从诸种要素与层面切入,对当代文学史料作了“整体系统”的研究,无论是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概念与形构的分析,对当代文学史料存在方式与问题等重要话题进行多维度的阐释,还是对别具“中国当代”特色的运动史料、版本生产、档案制度等内容的考察,都体现了吴秀明的学术视野与判断。当然,吴秀明在文献史料研究中的鲜明的问题意识,已超出了对当代文学学科规范化、学理化的期盼,这在《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研究应该与如何“及物”》等文中均有突出的体现。这些文章不仅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还关注到了空间维度的“文化中国”视域下的世界华文文学史料。此外,作为较早从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吴秀明以高屋建瓴的思维视野,在近年发表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基于文学史料的一种考察》一文中,按照“代际”理论将从事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学人分为三代,对其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爬梳,并对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文学教育方面的缺失进行分析,主张学人应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可以说,该文具有研究主体的意味,带有鲜明的反思性与前沿性,而这一点恰恰是现有研究中的盲区。进而言之,随着史料意识由初始的不自觉发展到近些年的渐趋自觉,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在体制、版本、选本、文类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也从历史化的角度推动了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内部转型。但正如李扬所认为

的那样,“‘历史化’还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还应当将自我‘历史化’”,<sup>④</sup>即强调研究主体的反思与自我调整。《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一文,正是吴秀明对研究主体之研究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他从另一层面对“学术根据地”的一种“超越”,值得引起重视。

众所周知,尽管截至目前为止,当代文学史的生存权问题已得到了解决,近些年层出不穷的各类当代文学史论著也从事实的层面对唐弢等“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判断作出了回应,但与古代文学史,甚至与近现代文学史相比,由于与复杂的政治因素杂糅在一起,当代文学史编写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和先天不足,尤其是体制性、现实性问题情况更加突出。毕竟,当代文学的研究主体与对象处于“同构”状态,“加之学风方面问题,使它在言说历史时不仅缺少严格的规范,而且往往显得比较随意乃至出现较多失判”。<sup>⑤</sup>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吴秀明根据自己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三卷本)、《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的实践,以及结合自身长期从事当代文学史教学的经验,“从专业化的角度,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发展、运行轨迹、创作批评、传播接受及其经验教训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爬梳”。<sup>⑥</sup>

与致力于“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的上编不同,中编“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是吴秀明在文学史教学与编写实践的基础上,对与文学史相关的学科特点、时空状态、编写问题等话题所作的多维考察。它不仅具有文学史本体研究的色彩,更为难得的是,还带有反思的品格。例如,《当代文学史编写三个问题及相关“选本”的编选》一文就专门对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内容的繁简问题、研究主体对文学史的“介入”等问题作了基于实践的分析。《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一文,主要从政治与革命的视角切入,对“历史化思潮”流脉及与历史观关系,“怎样看待政治”“如何评价革命”等难度较大而又敏感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和学理深度。尽管当代文学“历史化”因基础相对薄弱而困难重重,因话题的高度敏感性而带有一定的学术风险,但它却是通向学科化、进行自我升级转型的必经之路,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瓶颈。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回避。

与上述带有“超越根据地”性质的上下两编不同,“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吴秀明学术生涯所建构的第一个“学术根据地”,即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时下”的历史小说(历史文学)的创作做了基于文本细读的具体而微的考察。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领袖传记文学、“新故事新编”、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翻案”“影射”问题、“现代化”问题等等,它紧扣时代思潮,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此外,该编还从文学理论的层面,就历史文学学术史和历史观、真实观、艺术观的角度,对茅盾之于历史文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补遗式的探讨。这里收录的12篇论文体现了吴秀明学术生涯初期对历史小说(历史文学)及相关理论的倾力研究。虽然与上述两编紧扣文学历史稍异,下编主要是对当代历史小说(历史文学)进行了基于艺术审美的判断与评价工作,涉及《李自成》《曹雪芹》《戊戌喋血记》《星星草》《风萧萧》《金瓯缺》等作品,但“历史”始终是包括本编在内的自选集一个一以贯之的关键词,它体现了吴秀明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注。当然,对历史小说(历史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也为他日后对文学史、文献史料的研治理下了

伏笔,打下了基础。正如上文所言及的那样,在从事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学者中,不乏从评论转向而来的学者,这一现象除了与文学教育具有密切关联之外,也与上世纪80年代独特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氛围有关。毕竟,对于许多刚步入新时期的学人来说,相对自由的文学批评不仅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形式,还是难得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讨论,甚至参与舆论建构的契机,无论是对于伤痕文学的关注,还是对先锋文学的“力捧”,其背后或多或少均有此因由。正如吴秀明特意将历史小说(历史文学)批评纳入自选集的体系中一样,批评始终是当代文学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历史化的重要路径与方法,同时批评本身还是珍贵而又独特的一种当代文学史料,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价值。

可以说,《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不但很好地体现了吴秀明的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回到历史语境、向历史求真的性质与特点,还富有趣味地对他几十年学术生涯作了一次“重返”。由此及彼,笔者想到除了积淀尚浅之外,当代文学学科的先天不足还在于良好的治学学风与理念的缺失。或许比起蜂拥而至地对“热点”进行追踪,学界也需要沉潜下来,根据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进行批评与研究,即应有一种自觉的“学术根据地”的意识。这不仅意味着学人对于学术研究应有独立的判断与实践,还意指整个当代文学学科呈现的成熟与稳定趋势。当然,“学术根据地”的建构与超越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或画地为牢,事实上,正是在“学术根据地”的建构与不断超越过程中,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有效吸纳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不断取得进展。吴秀明在近几年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历史化“外源性”资源与“内源性”资源,就是一种自觉的“敞开”心态。他关注詹姆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寻找传统汉学、朴学的治学之术,不可不谓匠心独具。而这也正是《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及其所内蕴的“学术根据地”意识对当下的重要启迪。

#### 注释:

①② 吴秀明、赵卫东:《超越“根据地”,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吴秀明访谈》,《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③ 吴秀明:《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吴秀明学术论文自选集》后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④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⑤ 吴秀明:《当代文学史教材编写需要正视的三个问题——基于编写实践的一种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⑥ 吴秀明:《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吴秀明学术论文自选集》自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史婷婷,女,90后,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